

·诗苑译林·

叶夫图申科诗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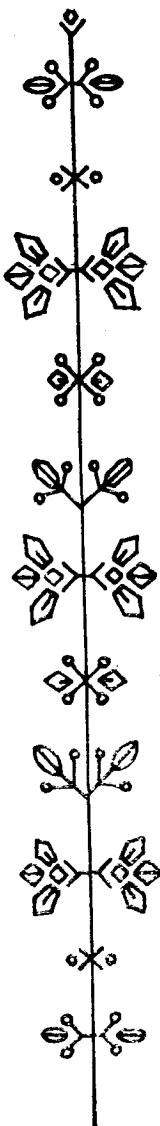
王守仁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诗苑译林·

叶夫图申科诗选

王守仁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叶夫图申科诗选

王守仁译

责任编辑：郭锐权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75 精页：5

印数：1—4250

平装：ISBN 7—217—00340—7
I·141 定价：3.25元

精装：ISBN 7—217—00341—5
I·142 定价：4.50元

新书目：88—46

苏联诗坛的第十三交响章(代前言)

——叶夫图申科及其诗歌创作

五十年代后半期，苏联诗歌出现了复兴，甚至可以说是“到了诗歌的时代”，这当中贡献最大的要算叶夫盖尼·叶夫图申科（1933——）。三十多年来，他始终对社会政治的迫切问题密切关注，对人的内心和人的命运深入观察，从而创作出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诗歌作品。大自“战争”与“历史”，小到一棵“新草”与“冰箸”，远自古老的罗马，近到故乡的小镇济玛，诗人无不写下了自己的见闻、经历和思考，表达了自身的深切感受和情感。他的创作热情极其旺盛，迄今已有十一万行诗和上百万字的散文作品，在当代苏联文坛上尚找不出第二个人有他那么高产。叶夫图申科思维敏锐，才华横溢，风格独特，他的诗的新颖思想和真理的火花，总是给人带来启迪和感悟。他的创作活动，无疑给苏联诗坛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如今，叶夫图申科是苏联最有影响，同时又是最具有世界性声誉的诗人。他的诗集在世界几十个国家翻译出版。西方文学评论家认为叶夫图申科是当代苏联诗歌星空中一颗亮度最大的星星。

开创“大声疾呼”派的一代诗风

作为一个诗人，叶夫图申科最初只是在抒情诗的领域里默

默地进行开拓，并未引起人们特别注意。但是，苏共二十大（1956）以后，他从“抒情诗的避难所”里走了出来，高举反个人崇拜的大旗，为普通人的命运和尊严而呼吁，立即引起轰动，成为诗坛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诗体现出人民精神力量的解放，人的感情世界仿佛从麻木中苏醒。他大刀阔斧，直抒胸臆，尽情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以敏锐的洞察力，慷慨激昂地抒发自己对当前社会政治问题的独立见解，对时弊无情针砭，为普通人的价值而反思和呐喊，开了以“大声疾呼”为特点的一代诗风。这样的诗，通常都是运用洗练的口语和含义深刻的象征形象，处理政治性和哲理性题材，不仅具有雄辩的风格，而且，就其抒发的思想感情来说，几乎都是“离经叛道”的。然而，叶夫图申科有坚定的信念，他以“时代的歌手”和普通人的“喉舌”自居。他不能容忍把人视为“螺丝钉”的理论，主动吹起了新时期的“时代前进的号角”：

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啊，
请把我当作号手一名！
我要吹起进攻的号角，
决不会吹错了音调，
如果当真我气力不够，
我便会用钢枪代替军号。

（《致一代人中的佼佼者》，1957）

这种振聋发聩的呐喊，是当时苏联诗歌创作中的一个具有时代性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历史和人的命运的反思，同时也体现出苏共二十大以后精神解放的社会情绪。从叶夫图申

科的诗中读者可以看出诗人的社会使命感。苏共二十大使他卷进了极其激动的情绪里面，他内心的情感和积郁有如火山爆发似的喷吐了出来，他以诗歌创作向虚伪、谎言、愚昧、专横发起了猛攻，把诗与时代紧紧地连在一起，使诗成为时代的心声。

叶夫图申科的政治诗，都是诗人面临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而激发出来热情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它们发自诗人的内心，虽然政论性很强，但却没有任何说教的性质，是名副其实的政论性抒情诗。例如，社会进步的一个很大的阻力就是顽固守旧，而在叶夫图申科笔下，这种守旧势力被形象地讥为“骑士”，其本质特点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表面上他们摆脱了不少旧东西，
骨子里却依然我行我素。

(《守旧骑士》，1956)

又如，在《温情》(1963)一诗里，诗人针对过去和现在一直“流行”的“在火葬场上为死者讲一番温情的话语”这一现象，高度概括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死人关心，对活人冷漠无情。”而且直截了当地发问：“这样的事，难道还可以继续下去？”这种独特的视角和巧妙的艺术构思，使诗既呼声雄伟，又深化了主题思想，完全属于叶夫图申科独具的风格。

叶夫图申科开创了新的诗风，无论从勇气还是从效果来说，都有超人之处。他敢于“触动社会机体的重要神经”，请看：

如今这已是遥远的往事。
内心里害怕什么人去告密，

或者听到敲门声而感到恐惧，
即使现在想起来也觉得不可思议。

还有跟外国人谈话所产生的恐惧？
跟外国人——这不必说！跟妻子呢？
怎能忘记上了楼梯之后孤身独处，
表上心头的那种无穷无尽的恐惧？

（《恐惧》，1962）

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會的縮影，也是人们心态的映照。这样的诗，无论从主题的现实性和迫切性，还是从思想之深邃和情感之真挚来说，都是令人叹佩的！

生活是诗的创作源泉。叶夫图申科的诗，来自他的生活经历和感受。他生于西伯利亚的一个小镇济玛，父母都是地质工作者，喜欢诗歌和音乐。但他幼年时，父母就已离异。在母亲的影响下，他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善于舞蹈，又熟谙音乐，十六岁时就在《苏联体育报》上发表过诗作，显示出诗歌创作的才能，十八岁时便进高尔基文学院深造。1952年，随着第一本诗集《探索未来者》的问世而登上诗坛。童年时他曾在故乡西伯利亚锯木厂做过工，还参加过地质勘探队，到过哈萨克斯坦和阿尔泰，后来随母亲迁居莫斯科。早年在西伯利亚的经历构成了他初期诗歌创作的主要题材。他既熟悉色彩斑斓的大自然，又了解一般市民生活。他祖父是一位学者，外祖父是农民出身的红军少将，但两人又都是肃反扩大化时的无辜受害者。苏共二十大使他豁然开朗，解开了长期积在心头的许多疑团。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他的激情有如春汛，感觉敏锐而新颖，在

大胆抒写的情感中，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与朝气。他既写国内现实生活，也干预国际政治，以大胆触及“尖锐”的社会问题而闻名，成为崛起的一代诗坛新人的代表人物。

叶夫图申科具有罕见的朗诵才能和惊人的记忆力，他的主要诗作，几乎全部能被他背诵出来。在苏联诗歌界，就朗诵才能来说，除了当年的马雅可夫斯基，说他首屈一指是当之无愧的。叶夫图申科充分意识到朗诵的效果和意义，他的许多有影响的诗篇，常常是在大庭广众面前多次朗诵之后才在刊物上发表的，所以，几乎每一首主要的诗早在刊出之前就引起广泛的注意了。当然，赞赏者和反对者兼有，但谁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常常是青年读者、听众对叶夫图申科的诗朗诵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抛掷鲜花，而少数批评家则抨击他以“敏感题材”去“耸人听闻”和“哗众取宠”。对于后者，叶夫图申科常常是漠然置之，他坚持以“真诚”为创作原则，并以“我独醒”的超然态度一如既往地抒写自己的真实感受和体验，通过朗诵与广大读者、听众沟通思想，交流感情，而这通常又是他的诗歌内容与形式臻完善的重要途径。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以叶夫图申科为首，诗歌朗诵蔚然成风，持续的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其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了。

毫无疑问，以叶夫图申科为首的“大声疾呼”派诗人虽然以其重大主题的诗歌使读者感到了时代的震荡，但不少作品对主题的表现显得浮泛、粗浅、缺乏感动力，似乎只追求手势和声响。就连叶夫图申科本人也曾追求过廉价的声誉。那时，他写诗、朗诵诗，据他自己在诗中说，正由于年轻，也曾受到“掌声”和“鲜花”的诱惑（《游艺舞台》，1966）。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声疾呼”派的不少政治诗都言之无物，失之空洞，只有

高昂和口号式的语调，却缺少诚挚、深沉的诗情，诗歌仿佛“疲于宣言式的喧嚣”，因而追求“田园牧歌”似的寂静，又由于审美观念的变化，“大声疾呼”派诗歌渐渐被“悄声细语”派取而代之。如果说“大声疾呼”派诗歌直接为政治服务者居多，那么，“悄声细语”派诗歌则更多是在诗美领域里进行探索，注重的是情感和复杂的内心世界，一般不写重大题材，较少抒豪情壮志。然而，在叶夫图申科看来，包括诗歌在内的文艺创作是决不能脱离时代、脱离现实生活的，而是要代表“人民的声音”，要干预生活、投入斗争：

诗歌生来就不是为了在舞台上亮相，
但它不耻于斗争。

诗歌，无论大声疾呼还是悄声细语，
千万不能虚假地文静！

（《悄声细语诗》，1971）

这种主张表明“悄声细语”派与“大声疾呼”派诗歌之间的正常的继承性和内在联系。就叶夫图申科的创作实践来说，似乎可以明显看出，他在表现重大主题的同时，也在孜孜不倦地深入人的内心，观察人的微观世界。而就艺术创作本身来说，叶夫图申科一向认为“不应当有被禁止的题材”，他主张“创作自由”和“写真实”。叶夫图申科及其诗歌创作对苏联诗歌的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仅就以他为首的“大声疾呼”派诗歌的历史功绩来看，也毫无疑问地可以说是构成了苏联诗歌史的重要篇章。

风格上的“博采众长”

风格是诗人创作个性的反映。早在1956年，叶夫图申科就在《序诗》中写道：

我感到亲切的，
既有叶赛宁，
又有惠特曼……

六年之后他又直言不讳，声称“至于我，不管看起来有多么多的折衷因素，我想在自己的诗中把马雅可夫斯基、勃洛克、叶赛宁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某些特点结合在一起。”^①又过了四年，叶夫图申科在《游艺舞台》一诗中，再次把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同称为自己的老师。就风格来说，马雅可夫斯基与叶赛宁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了，而在叶夫图申科的诗歌作品中恰恰就有这两种不同艺术风格的影子。例如：

对谎言凶狠
此乃善良！
就本质来说我是共产党人。
共产主义命令我，
对路上的绊脚石，
对听不进劝告的人，

^① 苏联《青年作家自述》，《文学问题》1962年第9期。

要凶狠再凶狠。

(《人们摇头对我说》，1962)

这样的诗，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无论从语言还是从风格，都可说是马雅可夫斯基式的！而下面这样的诗却仿佛出自叶赛宁的手笔：

是什么袭上了我的心头？
是对自身的怜悯和恐惧，
犹如暴风雪冲进了我的内心，
在晃动的骨节间呼啸不已。

是一片冰雪，可脚下仿佛象赤炭
烫着光脚的少年，
我的周围没有一点光亮，
没有台阶，没有房门，没有人面。

哭也白哭，喊也枉然，
天和地都听不见。
可怕的并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而是我的顾影自怜……

(《顾影自怜》，1981)

诚然，在风格上，初看上去，作为“大声疾呼”派的代表人物叶夫图申科，似乎是马雅可夫斯基的继承人，但是综观叶夫图申科的全部诗作，探究其艺术特点，便可以发现，他得之于叶

赛宁多过得之于马雅可夫斯基。

如同马雅可夫斯基，叶夫图申科也是在革命的信念和热情鼓动下产生出许多雄浑、宏壮而高亢的诗篇的。但叶夫图申科的抒情主人公大多是个人，即“自我”，而马雅可夫斯基的抒情主人公大多是集体，即“我们”。后者的抒情主人公虽然有时也以“我”的面目出现，但那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代言人。从这一方面来看，叶夫图申科倒是更接近于叶赛宁。当年，以马雅可夫斯基为首打破传统，使抒情主人公从“自我”到“我们”的这种变化，曾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诗歌的浪潮，也可以说是带来了一场诗歌革命，其影响之深远是十分明显的。事隔三十年，以叶夫图申科为首，又使抒情主人公从“我们”回复到“自我”，这并不是倒退，而是苏联诗歌波浪式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和标志，因为诗歌的发展永远也不能脱离时代，而时代的前进，不同的阶段又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就政治诗来说，叶夫图申科写得激情昂扬、淋漓酣畅，可以说与马雅可夫斯基的政治诗是一脉相传的。而就抒情诗，尤其就爱情诗来说，叶夫图申科则写得情感细腻、缠绵悱恻，可以说是师承了叶赛宁的抒情传统。因此，除了时代背景所产生的必然差别而外，拿叶夫图申科的政治诗去比马雅可夫斯基的政治诗，是再恰当不过了。而从抒情诗来看，拿叶夫图申科去比叶赛宁，也是十分贴切的。

叶夫图申科坚信：“文学不可能有空中之根”。他的风格就是在前人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形成的。他继承和发扬了涅克拉索夫的民主主义诗歌传统和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演说风格。叶夫图申科不仅没有割断与自己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联系，而且一向是有意识地深入探索和思考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一切，其中包括一向为诗人们所注意的国家命运、革命历史、卫国战争、

时代与人等等主题。但叶夫图申科并不满足于先辈的艺术构思方法、风格特点，更不依人蹊径、专学一家，而是“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有马雅可夫斯基的粗犷、激越，又有叶赛宁的细腻、深沉。与此同时，斯麦利亚科夫以及参加过卫国战争的一批诗人，如鲁科宁、维诺库罗夫、梅日罗夫，乃至“悄声细语”派的代表人物索科洛夫，都对叶夫图申科的创作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不过，叶夫图申科的博采众长，并非勉强效颦，而是自有创新，并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与我国古诗论说的“熔百家为一炉，出吾体于众匠”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不扮演任何人，
无论在谁面前，是不是迫不得已，
无论在农舍还是在兽皮小屋，
无论在舞台上还是在小酒馆里。

我不取悦于煽风点火的人，
每天都投入战斗，
为了保持自己的真实面目，
至死也要争取自由。

（《俄罗斯啊，我爱你》，1972）

永远“保持自己的真实面目”——这就是叶夫图申科的美学原则和风格特点之根本。

叶夫图申科诗的特色尤其体现在风格的变化上：既有激越昂扬的狂飙风格，又有哀惋和飘逸的风格。他的每一首诗都有

其独特的声音和色彩，给人以不同的印象，而不是在同一种情调之下的内容和字眼的变换。读者从他风格相异的诗中能够发现作者的感情与趣味是多么丰富。在叶夫图申科的诗中，读者还可以发现普希金、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风格和优良传统。他特别重视诗的“公民感”，即诗人在社会面前的责任感。在他看来，叶赛宁是最富有“党性”的诗人，因为他“传播的是公民的荣誉”，为此，叶夫图申科在回忆中情不自禁地写道：

哪怕只因为其中有你叶赛宁，
我也要说：俄罗斯啊你美丽无比！

（《致叶赛宁》，1965）

叶夫图申科在苏联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1971）上的发言中说：“我们这一代是高尔基、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茨维塔耶娃、曼德施坦姆、帕斯捷尔纳克、梅耶尔荷德的孙子，是肖斯塔科维奇、乌兰诺娃、法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等人的孩子，但同时又是苏维埃诗歌、散文、戏剧、音乐的年轻的父亲。”这里不仅包括苏联文学艺术的分期和传统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突出了文学艺术不同流派的风格特点的继承和发扬。风格同样具有时代的特征！传统与风格的继承并不等于生搬硬套、墨守成规，而是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否则必定会象叶夫图申科诗中所写的那样：即使“将大车吊起来”，它也成不了艺术品，——在火箭世纪它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火箭与大车》，1959）随着时间的推移，叶夫图申科本人的创作风格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传统了，不少青年诗人正在从他那里汲

取独特风格的营养。有迹象表明，叶夫图申科的艺术风格，将在苏联诗歌发展史的有关专章里占重要地位。

诗艺上的求新与开拓

叶夫图申科善于发现和总结前人的美学原则，进而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付诸实施。因此，他在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方面都有突出的建树。他说：“叶赛宁的创作秘诀，正是在于他对自己毫不留情”，而普希金本人也曾认为是“带着厌恶的心情翻阅自己的人生”。^①在这之前，叶夫图申科还明确指出，诗人只有象叶赛宁那样“公开承认自己的耻辱”^②才能取得抒情诗的成功，而这是需要勇敢的。在这一基础上，他在第五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进而指出：“只有无情解剖自己，才在道义上有审判别人，审判时代的权利。”是的，作为一个诗人，坦率地承认自己心灵的不完美，道德上的缺陷和自身的弱点，是要有足够的勇气的。应当说，在俄罗斯诗歌史上，具有这种大胆精神的诗人，无不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例如普希金、叶赛宁、阿赫玛托娃剖析内心的一些诗篇。叶夫图申科在剖析自我时，是极其大胆而又坦诚的。也许，正是在上述创作原则的指导下，才出现了他的这样的诗行：

我本身就各式各样——
劳累不堪
又游手好闲。

① 《四十岁是严峻的时刻……》，苏联《文学报》1973年2月28日。

② 《只有放开喉咙，才能发出洪亮的声音……》，《新世界》1970年第8期。

样

我是合理的
可又不合理。
我整个儿是互不相容的，
令人不快的，
我腼腆
可又无耻，
既凶狠
又和善。
(《序诗》，1956)

叶夫图申科总是从个人的生活经验出发，毫无隐瞒地吐露自己的真实感受和内心活动。这在三十年前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已习惯于接受那种不成文的美学原则，仿佛抒情主人公只能是完美无缺乃至形象高大的人，其内心世界的一切都必定完全符合公认的道德规范。应当说，叶夫图申科给苏联抒情诗带来了一种处理情感的新方法，尽管这种方法早在普希金和叶赛宁那里就已经出现过，然而不论是普希金还是叶赛宁，都不曾使这种方法上升为指导诗歌创作的理论。实际上，叶夫图申科是在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去清除“无冲突论”的影响，而在抒情诗中要清除这种影响却并非易事，因为长期以来大多数诗人习惯于“正面抒情”，抒情主人公的内心冲突、思想矛盾乃至隐私，是万万不能出现在抒情诗里的，否则就会被指责为“两重意识”、“个性分裂”和“精神失常”。毫无疑问，这是妨碍抒情诗发展以至扼杀抒情诗的一种偏见，因为人的精神发展、人的情感和感觉本身，都不可避免地充满了矛盾，而把这种矛盾以激情迸发的形式客观而真实

米 5 ⑥ 月 15 飞

地描述、表达出来，就会产生出真正的艺术，真正的诗！当然，这一切都不应该脱离道德的和社会的要求，否则诗就失去了诗的纯洁和高尚。叶夫图申科善于表现处于矛盾状态的心灵。在诗人的笔下，自我并非完整的统一体，并非绝对调和，而是常常相反，因此才产生出内涵极其丰富的诗来。

叶夫图申科的抒情主人公常常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幻想家、创造者、捍卫正义的骑士。这样的主人公又永远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想倾听所有人的心声，
想窥察所有人的面孔。

在生活中，这样的主人公永远都是朝气蓬勃、精力充沛，仿佛无限美好的未来都展示在自己的面前：

边界妨碍我。
不知道布宜诺斯艾利斯，
不了解纽约，
我感到不好意思。
我想去伦敦
游逛，
爱逛多久都行，
同大家交谈，
哪怕语言半通不通！
我要变成一个孩童，
吊在公共汽车上，